



杨慧林

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、文学学院院长、教授、博士生导师，主要研究西方文论和宗教学。兼任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、国家社科基金专家评审组成员等职。

## 杨慧林：演绎多样的人生角色

◎文·陈曦

他是博学多识的学者，潜心钻研西方文论和宗教学，颇有建树；他是儒雅温和的师者，用宽容与智慧影响着他的学生；他是睿智“霸气”的管理者，“培养第一流的人才，创造第一流的学术”是他的追求，多年来他兢兢业业，致力于学术和所在学院的发展。

他就是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、文学学院院长——杨慧林。

## 峥嵘岁月的“知青”

15岁那年,杨慧林从北京来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,在黑土地上书写了一段别样的青春。

当时的生产建设兵团条件还很艰苦,有些地方只能住帐篷。杨慧林和他的兵团战友们,曾自己动手盖起了营房。也许因为年纪太小,他在兵团并没有被分配到农业连队,但是炸石头、抬木头、扛麻袋他却没少干。据说最让他犯难的是扛麻袋,刚开始完全扛不动,但大家都不服输,杨慧林只好咬紧牙关,最终也能用稚嫩的肩膀扛起160斤的黄豆。杨慧林戏称这是“童子功”,直到今天,年届五旬的他也比一般人会干重活。一次爬黄山,他对朋友说自己能挑起挑山工的担子,朋友满腹狐疑,后来杨慧林果然挑着担子走了几百米山路。

艰苦的环境、繁重的劳动压抑不了人们内心对知识的渴求。那时候的“知青”求知欲很强。书籍匮乏,大家一有机会便到处搜寻。为此杨慧林也干过一些出格的事。一次他和几个同伴悄悄撬开一个仓库,“借”了几本书,而他“借”的书居然有一本《圣经》。当时看不懂,只是觉得故事很有趣,就当故事书看得津津有味。或许是机缘巧合,当年“借取”《圣经》的少年后来竟成了基督教研究专家。于是早在1990年,《新闻出版报》就曾刊载过方鸣的随笔:《“偷”了圣经之后:记青年学者杨慧林》。

回顾那段苦乐相伴的知青岁月,杨慧林感慨良多。那是他第一次远离亲人,独自面对生活,接受各种考验和挑战。在那个“万花纷谢一时稀”的年代,与来自全国各地的知青们住在一起,杨慧林的思维空间日渐开阔,对人对事都多了一份宽容和理解。面对不同的人,他学会了兼收并蓄、和而不同,这成为他后来成功执掌一个学院的要素之一。也是从那时,杨慧林开始认真思索“人”是怎么一回事,这成为他日后从事人文学术研究的起点。

## 博学多识的学者

恢复高考以后,杨慧林也像许多同龄人一样重新得到了读书的机会,其间虽有曲折,但最终在中国人民大学先后获得了文学硕士和哲学博士学位。多年来,他潜心治学,刻苦钻研,在西方文论和宗教学领域建树颇多,出版了《神学诠释学:圣言·人言》、《基督教的底色与文化延伸》、《追问上帝:信仰与理性的辩难》、《移动的边界》、《罪恶与救赎:基督教文化精神论》、《欧洲中世纪文学史》等诸多具有强烈文化情怀的论著,在学界引起强烈反响。

中国学者研究西方文化,在语言、知识背景等方面并不占优势。但杨慧林认为,中国人有自己独特的研究视角和天然的比较意识。所谓“不识庐山真面目,只缘身在此山中”,西方人对自身的文化太过熟悉,对有些东西反而不够敏感。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既有时间间隔,又有地域界限,如果能将自己的弱点变成特点,异邦的中国人未必不能更具洞察力。当年跟随导师赵澧先生做莎士比亚研究时,杨慧林正是从莎士比亚与基督教之间的潜在联系入手,完成了一系列被西方学者肯定的成果。这也为他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,乃至2004年美国一份著名的学术刊物为其出版英文论文专辑的时候,直接定题为《基督教在中国:杨慧林的研究》(Christianity in China: the work of Yang HuiLin)。如他所说,“这或许是中国学人做西方文化研究的一个机缘”。

从事人文学术研究二十多年来,杨慧林深切体会到其中的快乐与艰辛,“西方有本书叫Pleasure of Philosophy(哲学的乐趣),其实做学问的过程就是与古今中外最聪明的人对话,当然很有乐趣。但这个过程却很艰难,就像母亲孕育生命一样。人文学术对人的要求很高,必须觉得有趣、好玩才能坚持下去。”

那么当今这个浮躁的社会,能消化如此奢侈的人文学术思考吗?面对记者的疑问,杨慧林表示,他早已过了怀疑的年龄,对自己研究兴趣很难再动摇。他甚至越来越能理解历代书生“教育救国”的思想,因为读书、受教育确实会改变一代人的思考、话语方式和未来的选择。这可能就是人文学科“无用之用”的“大用”之所在。

在担任副校长以前,杨慧林每年总会有两三个月在外国度过。他认为国外的时光对他非常重要,可以集中精力做很多事,甚至比在国内一年做的事还多。而国内大学节奏快,教师事务繁杂,即使寒暑假也难以真正静下心来读书、思考。为此,他始终主张中国的大学不能太过喧嚣,而且应该建立“学术休假制度”,让老师们能有更多的时间不受外界干扰,更从容地阅读、思考、写作。

## 宽容儒雅的师长

在中国人民大学读书期间,有两位老师对杨慧林影响很大,一位是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创立者之一赵澧先生,另一位是我国宗教学学科创立者之一方立天先生。读硕士时,杨慧林跟随赵澧先生从事莎士比亚研究,其间对西方文论和基督教神学发生了浓厚兴趣,进而主攻西方文论和宗教学,与赵澧先生的

研究兴趣、思路产生了较大分歧。赵澧先生非但没有制止,反而全力给予指导和帮助。方立天先生在佛教哲学方面造诣很深,杨慧林追随其攻读博士时曾想选一个佛教与基督教比较研究的题目,便于方先生指导。但方先生却给杨慧林大开方便之门,鼓励他由着自己的爱好研究下去。

忆起恩师,杨慧林充满了崇敬之情,“两位老先生自己做学问都非常严谨,但是对别人总是非常宽容,他们从不要求学生维护什么‘门户’、或者所谓的‘学派’,他们甚至根本不希望自己的学生跟自己一样。他们更高兴的是给你一定的引导和启发,然后帮助你开创出一片新的学术天地。这些东西对我影响至深,我希望能够传承他们的宽容。”

杨慧林坦言,他总觉得与国外大学相比,中国大学的办公区少了些什么,至少是少了一点咖啡的香味——“我并不喜欢喝咖啡,但在国外时常常被煮咖啡的香味所吸引。其实喝什么并不重要,重要的是是一种宽松的气氛和环境。老师之间、师生之间需要这么一个交流场所,这应该是大学生活的一部分。”

“宽容不是一种姿态,而是需要足够的学养,需要对人对事的深刻理解和思考,这也正是一种人文学的品格。”身为师者的杨慧林一直努力传承着这种宽容,他给学生很大的研究空间,学生可以有自己的角度,只要材料扎实,思路严谨,他都可以接受。学生眼中的杨慧林是一个“非常有魅力的师者”——博学多才、儒雅温和、风度翩翩。其魅力不仅表现在为人治学上,还体现在讲课上。杨慧林的课向来是文学院选课人数最多、到课最齐的热门课程。学生张炜告诉记者“杨老师的课深入浅出,形式新颖,能将枯燥的理论讲得生动有趣,并结合自身经历,传达给我们许多人生的哲思。”学生杨静说,“杨老师讲课旁征博引,信息量大、思想内涵丰富,充满浓浓的人文情怀。”杨慧林主讲的课程“西方文艺理论史”先后获北京市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、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;他本人也荣获“北京市高等学校教学名师”的称号。

而杨慧林在人大学生开学典礼、毕业典礼上的几次发言,也令许多学生津津乐道。他将“行为精英,心为平民”理解为人大学生“受用终生的财富”。按照他的说法:“行为精英”就是追求高贵的精神,“心为平民”就是谦卑地做事和做人。精神不可以不高贵,否则

就不敢从“不可问”的地方问起,也就谈不上真正的学术;作人不可以不谦卑,因为只有意识到自己的限度、意识到知识的限度、意识到人的限度,才能最终成就自己、成就知识、成就人本身。

### 睿智“霸气”的管理者

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的历史不算长,却有着悠久的传统和底蕴,也拥有众多前辈长者、学界先驱,如吴玉章、何其芳、谢无量、繆朗山、赵澧、冯其庸、蔡锺翔、成复旺、胡明扬等等。杨慧林求学期间,从中受益良多,并逐渐养成了一种天然的使命感。受命担任文学院院长之后,他更是感到责任重大,一心为文学院营造宽松、和谐的环境和浓郁、纯粹的学术氛围。

杨慧林坦言,他总觉得与国外大学相比,中国大学的办公区少了些什么,至少是少了一点咖啡的香味——“我并不喜欢喝咖啡,但在国外时常常被煮咖啡的香味所吸引。其实喝什么并不重要,重要的是是一种宽松的气氛和环境。老师之间、师生之间需要这么一个交流场所,这应该是大学生活的一部分。”于是,在他的策动下文学院建了个咖啡屋。咖啡、蒸壶、咖啡勺、小点心、包括中国的茶叶都是老师们捐赠的。杨慧林非常愉快地告诉记者,老师们喜欢在这里会客、休息,而这种轻松随意的环境有助于促进大家的交流,学生也会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。

“老师们捐献的东西很不一样,有速溶咖啡、咖啡豆,有花茶、绿茶、铁观音、柠檬茶等等。其实这就像大学的多元化一样,英语中university(大学),本来就可以解释为unity with diversity(多样化的结合)。这样的学术环境才能陶冶性情,才能尊重和倾听不同的声音。”

2005年以来,杨慧林每年都会请艺术学院帮忙,举办“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新年音乐会”,在中国大学开创了“学院级”交响音乐会的先例。他还为新年音乐会起草了这样一份请柬:

古代希腊“以巫术治疗肉体,以音乐净化灵魂”;中国先哲亦称“移风易俗,莫善于乐”。是故仲尼问韶,识虞舜之德;季札听弦,知众国之风。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敢以前贤为鉴,以新年音乐会恭迎各位前辈、校友和学界同仁。

如今,人大文学院的办公区常常充盈着浓浓的咖啡香,越来越多的老师、学生聚在暖暖的咖啡屋里,谈学术、话人生;而每逢新年,又都有专场的交响音乐会等待着他们,何其乐哉!

高效是杨慧林所追求的又一管理特色。作为一

院之长,他尽量控制开会的时间、规模和次数,以节约所有老师的时间。文学院开会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,每个人讲一件事不能超过3分钟,而发言不能只提出问题,还要给出解决的办法或者建议。在杨慧林看来,节约时间会形成一个良好的风气和高效的工作习惯,其实很多问题并不需要详细的解释和论证。杨慧林奉行各司其职,而不是大包大揽的工作作风。他认为,学院的各项事务都有专人负责,自己不必事事过问。他一般不会干涉主管人,乐于维护主管人的判断力和处理方式,如果发现问题,他也会同大家一起商量。

俗话说,“栽好梧桐迎凤凰”。人大文学院宽松、有序的环境吸引了许多优秀学者的加盟。仅以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为例,近五年新增的学者就有精通数国语言的奥地利学者雷立柏教授,曾在美国留学并从事研究12年的耿幼壮教授,曾在德国留学并从事研究13年的杨煦生副教授,以及留学法、德的夏可君副教授等等。提起他们,杨慧林如数家珍,“这些学者的学术背景不同,他们不同的学术视角、治学方法会产生很多思想的碰撞,而且他们各自熟悉的文献也不同,这会为学生的论文开题、写作和答辩提供宝贵的线索。”

在杨慧林的带领下,人大文学院经过多年的积累、努力,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。近几年文学院教师发表的700多篇论文中,包括美国SSCI和A&HCI检索论文9篇;文学院近三年承担的58项研究课题中,从国际合作项目获得的资助占经费总数的23.49%;文学院还利用国外学术研究基金主办了近10次国际学术会议,并邀请了数十位国外学者来访。仅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学期,文学院就有来自英国牛津大学、格拉斯哥大学、美国芝加哥大学和耶鲁大学的四位学者与杨慧林共同讲授“人文学术的问题与方法”,使听课同学直接领略到世界顶尖级大学的不同风格、传统及其对“问题”与“方法”的理解。这样高密度、高水平的国际化教学和科研活动,在全国高校的人文学科中是相当少见的。

另外,文学院院长长期主办着七种“人大复印报刊资料”,并自办《文学论集》、《语言论集》、《马列文论研究》、《中国苏轼研究》、《问题》、《基督教文化学刊》等六种学术辑刊。其中有的学术辑刊已经被“中国社会科学院评价研究中心”列入CSSCI核心期刊数据库。以此为基础,杨慧林不断“鼓动”文学院的各主要学科逐步推出自己的“五个一”,即:一本学术辑刊、一个国际论坛、一套译丛或论丛、一套教材、一个独具特色

对于自己当选,杨慧林有独特的理解,“我觉得学校要我做副校长,其实并不是选择我个人,而是表达了人大对人文学术的高度重视。”杨慧林表示,他在担任副校长以后不会放弃自己的教师工作和学者本色。在他看来,这不仅是学者立身的根基,也是做好大学管理工作的重要前提。

和优势的研究方向。

2007年世界汉学大会的成功举办引起了国内外热烈反响,文学院在其中发挥着主要作用。去年,“汉学研究中心”和“汉语国际推广研究所”又落户人大,这可能是迄今为止中国人文学科最大的研究项目,首期拨款1200万。目前人大已在文化大厦6层建立专门的项目研究基地,并安装了先进的视频会议系统,通过这一系统,可以随时与世界上任何一所大学交流、对话。

在杨慧林看来,人大之所以能在中国的人文学术领域占有重要的地位,文学院之所以能够在近些年得到较快发展,是与纪宝成校长的努力和支持分不开的。“纪校长是一位很有霸气的校长,霸气不是霸道,而是要么不做,要做就做最好的。”杨慧林认为,做学术必须有霸气,必须取法其上,做一流的学术;一所大学、一个学院也要有霸气,要努力成为最好的,至少要在某些方面达到最好。正如他在文学院寄语中所说的那样,“培养第一流的人才,创造第一流的学术”,这才是“以学术为本、以学生为本、以学人为本”。

前不久,中国人民大学公开竞聘副校长一事尘埃落定,杨慧林与法学院院长王利明同被任命为副校长。对于自己当选,杨慧林有独特的理解,“我觉得学校要我做副校长,其实并不是选择我个人,而是表达了人大对人文学术的高度重视。”杨慧林表示,他在担任副校长以后不会放弃自己的教师工作和学者本色。在他看来,这不仅是学者立身的根基,也是做好大学管理工作的重要前提。